

中国式现代化
CHINESE MODERNIZATION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实践向度

■ 邱耕田

作为一项总体性、主导性的发展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着三重实践向度:求取利益、增强力量、明晓道理,简称趋利、强力和明理。这三重向度同时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或承担的三项基本任务,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功能的认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趋利向度

现代化活动的主体是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结构包括两个方面:领导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主体是中国人民。中国式现代化主体视角的一个基本向度就是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趋利性或求利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或基于“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理解的根本向

度,就是要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是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当然也与利益有关,利益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杠杆。这种价值杠杆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内在的“天然”的趋利性或求利性。趋利性主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

言以蔽之,就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他们各方面的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当然也与利益有关,利益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杠杆。这种价值杠杆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内在的“天然”的趋利性或求利性。趋利性主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

当然,力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物质性力量如生产力、科技力、国防军事力量和精神性力量的统一。这种精神力量或思想力量的极端重要性,有必要将其独立出来,使明理或讲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完成的又一重要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力向度

关系来看,利益具有源头性、目的性,它决定着这种力量包括力量的产生、运用及其运用或作用的方向、方式等。相对于利益,力量具有衍生性、手段性,它对利益的实现具有重大的反作用。有利益一定要有力量,力量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和保障。没有这种手段,利益既无法实现,也无法巩固。一般而言,有多少力,就有多少利;力强则利大,力弱则利小。这表明,在一般意义上,利益的优劣多寡,实现的顺利与否,与力量的强弱大小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现代化是一个普遍的、必然的历史现象,任何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有对利益的追求,但并非所有国家主体都能实现或很好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国家主体在求利方面的不同,除了利的内容、特征等不同之外,剩下的主要就是求利的方式或手段的不同,即力量的强弱不同。力量强大的主体,会获取更多更好的利;力量弱小的主体一般在实现自我利益方面如在质和量方面及在实现的进度、程度等方面困难重重。可见,把主体

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理向度

总称,或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之理的要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具体内容:

第一,对现代化的本质、规律、属性、条件等进行探究,为现代化实践提供认识论或知识论的支撑;

第二,在把握现代化的本质、规律、发展趋势等基础上,分析探讨现代化的方法、原则、要求等,为现代化实践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

第三,对现代化的演进方向进

行规划调控,特别是对人在现代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科学把握,从而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价值观念层面的指导;

第四,通过适当而有效的方式或做法,向其他现代化主体宣传、展示、解释“我”之现代化实践的做法、目的、意义等,以获得其他现代化主体的认可、支持;

第五,以美好的发展愿景或发展蓝图激发调动大多数社会成员积极投身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重向度的辩证关系

现代化之理,一方面受利和力的支配,另一方面又对现代化的趋利和强力实践发挥重要的反作用。

就利和理的关系来看,理的现实基础和落脚点是利。利对理起着支配作用,它决定着理的形成、内容、表现和演变等。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利,就会有什么样的理。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就明确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没有利特别是物质利益,理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成为空洞的说教。当然,理中包含着利,它对现代化的趋利实践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它能从

理论观念的角度观照、反映、说明、维护、指导着人以力量为中介、为手段的趋利活动。只有理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利、如何实现利,哪些利是合理的、哪些利是不合理的,实现利的根据、原则、方法特别是模式、意义等;另一方面,理对趋利实践起着解释宣传的作用。

就力和理的关系来看,一方面,根据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客观的力决定着主观

的理,理既受制于利,也受制于力。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理一定要有力,否则,这个理就会无人理会。这里的力主要包括生产力、科技力、军事力、组织力等。亨廷顿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物质的成功带来了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实力。”

另一方面,理对力又有巨大的反作用。理对力的生成及其使用发挥着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的指导作用。通过理,人们能认识力,把

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在利益主体的角度,它是本国利益和人类利益的统一,或是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所求之利,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其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即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也承担着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重任。中国式现代化所求之利,具有合理性、全面性、可持续性。

区别开来的主要是力量而非利益。当今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这些国家在根本上并非非利益上的“弱”,主要是力量上的“弱”。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关键在于其力量的强大,即强大的国力维护着其至上的国利。因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就必须设法强起来,这是我们追求强起来的重要现实依据。

当然,力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物质性力量如生产力、科技力、国防军事力量和精神性力量的统一。这种精神力量或思想力量的极端重要性,有必要将其独立出来,使明理或讲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完成的又一重要任务。

国家的历史洪流中去,从而形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良性合力。

根据上述具体内容来看,理在现代化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理的反映和观照作用、理的价值指导作用、理的方法论作用、理的解释说明或宣讲作用、理的规约作用、理的组织激励作用等。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导型、统领型的“理”,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着根本的指导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只有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握力的本质和规律;通过理,人们也能获得一种科学的力并能使其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如果没有理,力往往带有粗放性和野蛮性,理使力自觉化、科学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的理与强大的力的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主体的自我利益。

总之,现代化实践中的趋利向度、强力向度、明理向度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利是力之源,力是利之器;有利应有力,力强则利大;人人都逐利,视力分高下;有力才有理,无力理是“气”;理中含着利,理使力“合理”。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对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处理好变乱交织的中美关系,粉碎“台独”势力挟洋自重、分裂国家的图谋,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善于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统战思想、统战策略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斗争求合作,促统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向抗日根据地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40年3月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对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政策

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政策。

提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深刻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阶层和各党派,将其分为进步、中间和顽固三种政治势力,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有关发展、争取、孤立的策略。

对中间势力范围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毛泽东指出,中间派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是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利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对于这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但是,由于“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斗争;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提出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同发展进步势力与反对顽固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毛泽东提出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提出“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原则。所谓“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谓“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所谓“有节”,即休战原则,在打退顽固派进攻之后,必须“适可而止”,主动同他们讲团结,订立和平协定。

毛泽东在著作中确立的策略原则,使得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矛盾问题。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正确实施,避免了统一战线的“左”倾、右倾错误,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策略基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在新时代用好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其中,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中国崛起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崛起,同时,对“台独”分裂势力纵容支持。因此,保持高度清醒,认真学习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处理好变乱交织的中美关系,做好反“独”促统工作,具有重

发扬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
篆刻:宋丙飞

提高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
篆刻:宋丙飞

读《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有感

■ 沙海林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以斗争求合作促统一

经典重读

要的启发、借鉴和指导意义。

首先,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打压和遏制,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针对美国国内极端反华势力的反华行为,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以妥协求合作,则合作亡。在敢于斗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善于斗争,刚柔并济,把握好度。要做好争取美国广大中下阶层和中间势力的工作,做好美国的知华友华的智库、民间团体、工商界人士、青少年的工作,加强中美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要做好“中间派”欧洲国家的工作,处理好与欧盟以及欧洲国家的关系。本着“亲、诚、惠、容”的理念,加强与周边邻国的交往合作。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发展中国家发展,奋力拓展发展中国家“朋友圈”。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做好在美华裔侨界人士的工作,发挥统一战线在促进中美民间外交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还要主动做好在华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外国友人的工作,积极做好西方媒体人士的工作。

其次,开展反“独”促统斗争,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针对“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图谋,一要精准研判,分类施策。针对民进党内的顽固派、务实派、温和派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工作策略。对于统战力量中的左、中、右,也要在科学研判基础上分类施策。加强对统战力量的培植和整合,努力形成一股受台湾各界支持并能与“台独”势力坚决斗争的强大势力。对“不统不独”的中间力量,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示之以力、导之以利,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二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与台湾有关政党、团体就两岸关系与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夯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三要切实做好台湾各阶层人士的工作。积极支持台湾同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促进两岸民间更深更广的心灵互见。支持鼓励两岸青年加强往来,进一步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实习、就业、创业搭建平台,提供服务。

总之,处理好变乱交织的中美关系,粉碎“台独”势力挟洋自重、分裂国家的图谋,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善于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统战思想、统战策略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斗争求合作、促统一,为构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促进祖国完全统一作出统一战线的新的贡献。(作者为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会长)